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陈开科
著

十年

嘉庆

失败的俄国使团
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陈开科
著

十年 嘉庆

失败的俄国使团
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陈开科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97-5667-6

I. ①嘉… II. ①陈… III. ①中俄关系—历史事件—
研究—嘉庆(1796~1820) IV. ①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6899号

嘉庆十年

——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著 者 / 陈开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责任编辑 / 赵 薇

责任校对 / 张 羨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667-6

定 价 / 98.00元

印 张 / 32.25

字 数 / 493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窗含西岭千秋雪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们的记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记忆。如果一个民族失去记忆，必将退化到比猿人还要蒙昧的状态，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不断激活民族的记忆，让民族从自己的记忆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今天，预知明天，使整个民族聪明起来。因此，凡是有助于提高民族智慧的历史记忆都应当激活，都应当加以研究。恩格斯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全部历史”，不是一部分历史，也没有分什么重要历史或次要历史；他说的是作一番“新的研究”，不是简单地重复。这就告诉我们，搞历史研究不允许留下“空白点”，研究要不断创新。历史空白点就是民族大脑上的盲点；盲点多了，这个民族就会退化成愚蠢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就无立足之地。《嘉庆十年》就是一部填补历史空白，创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著作。

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沙皇俄国派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于年底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戈洛夫金因拒绝演习觐见嘉庆皇帝时所要施行的三拜九叩之礼，于嘉庆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06年2月15日）被清政府逐回。这件事，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来看，都是极其一般的失败的外交事件。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一般的失败的历史事件不值得研究，因而我们长期看不见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著作。其结果是：中俄关系史研究热点从《尼布楚



条约》《恰克图条约》一下子跳跃到《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造成中间 100 多年的历史空档（当然这期间以恰克图贸易为中心的中俄贸易关系还是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但是，这期间中俄许多外交往来事件被忽略了）。陈开科以史学家敏锐的眼光，选取别人看不上眼的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写成专著《嘉庆十年》，填补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空白，激活了民族大脑的一个记忆细胞，让人们思考，从中得到教益，增长智慧，这项工作，没有很好的“史识”是做不到的。

戈洛夫金使华失败仅仅是中俄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作者不是孤立地阐述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而是以崭新的思路，将之作为早期中俄关系史全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考察，进而将它放在中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更进一步将其放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把这一外交事件放到外交史链条及世界大势背景下审视，既反思外交事件本身，又为未来将要发生的外交事件寻找历史依据。作者认为：“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是中俄两国社会整体发展态势差别的一种反映”；“它不但是当时整个东、西方外交接触中的一环，也是当时俄国远东外交活动链条中的一环”；“戈洛夫金使团事件既是中俄两国异质文化的冲突，又是现实政治层面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以抽蕉剥笋般的分析剖解，淋漓尽致地揭示出隐藏在这一事件背后的历史内涵。

作者指出嘉庆朝是清代由盛到衰的转折期，也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旧的生产关系急需变革的转折期。当时欧洲主要国家经过文艺复兴、环球航海、发现新大陆、倡导重商主义、实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一系列的变革是世界发展潮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从内政到外交实行彻底改革，融入这一世界发展潮流，赶上这个潮流发展的步伐，否则必被世界潮流冲垮。而高度封建中央集权的清帝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实行海禁、抑商的农本主义，将西方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在需要进行改革的时候拒绝一切改革。尽管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嘉庆是无可指责的帝王，但他缺乏开拓进取的精神，集中全部精力守成。所谓守成就是坚守祖宗之法，维护政权稳定，对内对外一律实行保守政策。

岂知，这是扬汤止沸，越是千方百计地维稳，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就越发尖锐，国力就愈发衰败。反观俄国，虽然比西欧落后，但经过彼得一世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实施强有力的重商主义，约从18世纪开始，俄国逐步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虽然未必弱于俄国，但其社会发展态势却无法与俄国相比。尤其在18、19世纪之交，中国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融入世界潮流的迹象，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中、俄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后果到19世纪中叶便显现出来，俄国乘中国无力抵挡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之机，攫取中国大片领土，建构起两国关系的不平等格局。

实际上，戈洛夫金使团的东来给清政府带来了严重信号。俄国政府所赋予使团的重大外交使命，确定了俄国19世纪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贸易方面，除保持恰克图贸易外，将贸易范围扩展到中国全境，参与广州贸易，在中国长江流域开通商口岸，通过西藏、新疆，与西亚、南亚地区开展贸易；在边界方面，准备推翻中俄《尼布楚条约》，占领《尼布楚条约》中待议的乌第河流域大片土地，取得在黑龙江的通航权，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等。这些对华战略目标正是俄国从19世纪初就开始追求，到19世纪中叶实现的。

而嘉庆朝从没有制定明确的对俄政策，更不想了解俄国对华有何战略企图。俄国主动派遣使团访华，对中国而言，正是了解俄国对华外交意图的良机。但嘉庆皇帝对此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是人家送什么礼物（“贡品”）、行什么礼节。清廷依然将戈洛夫金使团视为“朝贡”使团对待。其实，与英、法等西方大国不同，俄国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已经将一个强大帝国的形象展现在清帝国面前。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接受中华正朔的“藩属”，而是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危的强大邻居，必须从外交和国防方面认真对待。但是，清廷却颞预自负，根本没有考虑俄国使臣因何而来，如何应对，仅因礼仪之争，就将使团驱逐出境，失去了一次解决中俄东段边界问题的有利时机。作者指出：“根据当时戈洛夫金制定的三层方略，无论按哪层方略办，中国都能保住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作者进而指出：“由于戈洛夫金使团未能到达北京，因此也就未能将俄国此时



对华政策的新内容和盘托出，以致清廷对当时俄国觊觎黑龙江以北至海大片领土的阴谋毫不知晓。尽管清朝即使了解了俄国的侵略企图也未必能改变未来 19 世纪中叶的外交败局，但至少可以做到知己知彼，早为预防”；“清朝根本不知道沙俄的对华领土要求，自然就无人关注东北问题。当半个世纪后面临沙俄处心积虑已久的领土侵占时，内忧外患的清朝竟然无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抵抗”。由此作者得出全新的历史结论：“戈洛夫金使团的被逐对俄国来说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失败，却奠定了日后俄罗斯在远东对华外交战略上的胜利；而对中国来说，这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外交战术上的胜利，却埋下了日后对俄外交战略失败的种子。俄国失败了一个外交使团，清朝则失败了整个外交战略。”这一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所得出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但作者所揭示的历史教训远不止此。作者以戈洛夫金使华为观察点，从而将嘉庆朝定为清帝国应当进行改革的节点。也就是说，改革要选在社会矛盾已经暴露但尚未达到最尖锐程度，国家尚有力量的时候进行。到光绪实行戊戌变法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极度尖锐，国家衰弱不堪，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即使没有慈禧太后的反对，变法也很难成功。

作者的研究方法最突出的创新之处是以小见大，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以小题目揭示历史大内涵，用工笔画的方式展现历史画卷，从一个历史节点观察中俄两国历史发展大势，两国关系发展大势，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做出历史结论，引出历史教训。这里，我不禁想起杜甫那首著名的《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眼前两个黄鹂、一行白鹭摄取小景，然后将镜头放大放远，看到窗

子外头千里雪山，门外来自万里之外的东吴舰船。《嘉庆十年》的研究方法与杜甫写这首绝句的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作者史才丰厚。

一个不忘历史，正视历史，保留历史的民族才有未来。希望在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不断有像《嘉庆十年》这样的著作出现，填补那些不被注意的历史空白点，以增长我们民族的聪明才智。

薛衔天

2013年6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前言 嘉庆十年的中俄交涉 / 1

一 盛衰大局：18、19 世纪之交的俄国与中国 / 17

（一）世纪之交俄、中两国所面临的世界大势 / 18

（二）世纪之交俄、中两国的内政外交与世界大势 / 34

（三）世纪之交的俄中关系格局分析 / 83

二 使团使命：19 世纪俄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 147

（一）贸易使命：全面扩展俄中“商务边界” / 148

（二）外交使命：重新划定中俄东段边界的计划 / 161

（三）附带使命：西班牙沉船申述及汉籍收集 / 177



三 国书往来：俄国政府组建使团的倡议与清政府的呼应 / 183

四 圣彼得堡的忙碌：俄国使团的组建 / 192

（一）人员与费用：遴选的认真与费用的充足 / 193

（二）礼品：俄国工业发展水准及历史文化的展示 / 202

五 北京的热情：清政府对俄国使团性质的认定及接待准备 / 212

（一）“贡使”：清政府对俄国使团性质的认定 / 213

（二）“贡时”：清政府对俄国使团进京时间的建议 / 224

（三）“贡道”：清政府对俄国使团进京路线的规定 / 232

（四）“贡护”：清政府对俄国使团路途安全的考虑 / 239

六 库伦的寒气：中俄边境的礼仪之争 / 251

（一）圣彼得堡—库伦：俄国使团的艰难跋涉 / 252

（二）明争暗斗：俄国使团抵达库伦之前中俄的外交争吵 / 257

（三）库伦的叩拜礼：中俄两国的礼仪之争 / 310

七 是与非：中俄两国政府对待使团被逐事件的态度 / 353

（一）戈洛夫金与沙俄政府对使团被逐的态度 / 354

（二）库伦办事大臣与清政府对俄国使团被逐的态度 / 366

八 和与防：中俄边境双边交往政策 / 373

（一）中俄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互相防备 / 374

（二）中俄双方努力维持边境和局 / 380

九 调查与规划：戈洛夫金在西伯利亚 / 386

（一）俄国使团到达库伦之前戈洛夫金及使团成员的沿途调查 / 387

（二）俄国使团被逐之后戈洛夫金及使团成员在
西伯利亚的科考 / 395

十 善后：戈洛夫金使团的遗留及关联问题 / 407

（一）礼品的处理问题 / 408

（二）使团成员的奖励问题 / 423

（三）第九届布道团的续派问题 / 429

（四）中俄有关续派使团问题的交涉 / 441

结论 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 / 451

参考文献 / 468

人名索引 / 487

后 记 / 496

前言 嘉庆十年的中俄交涉

18 19 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本来风平浪静，但嘉庆十年（1805）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外交事件——俄国戈洛夫金（Ю. А. Головкин, 1762–1846）使团访华失败，从而使中俄关系变得微妙。一时间，中俄中段边境地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奇怪的是，雷声大而雨点小，中俄双方都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态度，以致最终并未酿成军事冲突。如今，此事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审视，发现这个失败了的戈洛夫金使团在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件半途而废的失败的外交事件，为 19 世纪中叶复杂的中俄关系格局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1803 年 2 月 25 日（2 月 13 日），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Н. П. Румянцев, 1754–1826）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 1777–1825），请求向中国派遣使臣，以商谈有关在广州开展贸易的事情。^①是年 11 月 28 日（11 月 16 日），俄国枢密院以国书形式征求清政府的意见。1804 年 3 月 5 日（2 月 22 日），清政府回复，同意接待俄国使团。^②但俄国政府办事缓慢，使团拖到 1805 年 5 月上旬才出发，迟至 1806 年 1 月 14

①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7. оп. 6. 1802г. д. № 1. п. 2. л. 2–3.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и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42.

② АВПРИ 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 1–7. оп. 6. 1802г. д. № 1–а. п. 1. л. 45–46. Там же с. 56.



日（1月2日）才抵达中国边境城市库伦。此后双方在礼仪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清政府遂于2月初将戈洛夫金使团驱逐出境。就史料来看，事后中、俄两国政府基于各自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努力淡化该事件对两国关系所产生的阴影，维护了两国边境的安定和睦局面。但表面的和局掩盖不了隐埋的深忧。随后的历史事实表明，这桩严重的外交事件最终对整个19世纪的中俄关系发展态势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不过，多少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对这样一桩不幸且影响非常大的外交事件，俄、中两国学者都缺乏深入的专题研究。

当然，缺乏深入研究并不意味着无人关注此事。自使团铩羽之后，俄国学界就已开始整理戈洛夫金使团事件的相关史料。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取得了较大成绩。

首先，自戈洛夫金回到圣彼得堡之后，就有使团成员陆续发表自己的旅途札记或回忆录。^①其中最先发表的相关文字是画家亚历山德罗夫（И. П.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780–1822）的旅途书简（1806），介绍了从特洛伊茨萨夫斯克要塞至恰克图一路上的种种印象。^②1807年，使团拉丁文译员斯特鲁威（Х. А. Струве）又发表了两篇相关文字：一篇发表于柏林的《地理拾零》，还有一篇发表于《圣彼得堡公报》（*Gazette de Petersbourg*）。这两篇文字内容差不多，主要是依据亲身经历，记述了俄国使团访华失败的历程，对此事发表一些个人看法和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对使团说一句好话。他认为，俄国访华使团的使命不切实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所选择的大使戈洛夫金也十分不称职；使团人数众多，一半人是多余的；使团到达边境的时间也极不合适；使团官员在库伦的表现也十分令人不耻；^③等等。1808年，使团医生列曼（О. О. Реман, 1797–1831）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加尔湖地区矿泉水的文章。稍迟，1819年，使团画家马丁诺夫（А. Е.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говорными статьями утвердил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XVII–XX вв. М. 1996. с. 257–258.

②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И. П. Письмо молодого художника из Кяхты своему приятелю 1805 года.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835–836.

③ Струве Х. А. Рус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Китай в 1805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903–906.

Мартынов, 1768–1826) 也出版了一部旅途写生集《从莫斯科到中国边境的旅途素描》，发表了 30 多幅沿途风景画，每幅画都附有生动简要的文字说明。^① 1823 年后，克拉普罗特 (Г. Ю. Клапрот, 1783–1835) 有关恰克图实地考察笔记及相关俄中关系研究的著作问世。此外，多年之后，还有一位使团成员维格里 (Ф. Ф. Вигель, 1786–1856) 的《笔记》也得以出版。^② 这份笔记对组建使团的过程包括使团人员的选拔、旅途情况，以及使团在库伦与清政府官员们的交涉情况等做了详尽的叙述。因为所记乃作者亲历，比较真实客观，是了解戈洛夫金使团的重要资料。

当然，真正具有史料整理意义的工作是从巴斯宁 (В. Н. Баснин, 1800–1876) 开始的。他在自己的著作《戈洛夫金伯爵使华》中，从 17 个方面（如“使团成员”“使团出发”等）比较详细地调查并简述了俄罗斯档案馆中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档案材料。可惜，他没有说明档案资料的收藏地点以及所属卷宗，档案的标题也付之阙如。从他对材料的编排和取舍，我们可以看出，他试图确立评价整个事件的基调。^③ 实际上，此书主要是一个编年性质的档案资料提要（档案资料的原文未获整理）。

当然，史料编辑工作取得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在当代。由著名史学家齐赫文斯基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院士和米亚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院士挂帅，组织了一批致力于研究中俄关系史的专家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集《19 世纪俄中关系 (1805–1807)：资料与文件》(第 1 卷)。其中收集了俄文、法文、满文、汉文、蒙文和拉丁文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档案文件 536 份，每份档案资料的收藏地点、档案所属卷宗等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尤其有价值的是对每份档案所涉历史名词和历史人物都做了非常详尽的注释。这部资料集为我们拨开笼罩在戈洛夫金使团身上的迷雾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基础，功不可灭！唯一有些遗憾的是，每份档案资料的时间都被换算成俄历，给

① Мартынов А. Е. Живопис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от Москвы д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СПб. 1819. с. 67.

② Вигель Ф.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Ф. Ф. Вигеля о его поездке в составе посольства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Цискую империю (1805–1806).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IX веках. 1803–1807. М. 1995 г. с. 765–834.

③ Баснин В. Н.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й графа Головкина. М. 1875 г. с. 103.



研究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惑。^①

然就研究层面观察,相对来说就要逊色多了。专门研究戈洛夫金使团的专题著述极为稀见。无论是莫罗什金(М. Я. Морозкин)、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院士、特鲁谢维奇(Х. Трусевич)、巴托尔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 1869–1900)院士,还是别兹普罗兹万内赫(Е. Л. 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斯拉德科夫斯基(М. И. Сладковский, 1906–1985)、库尔茨(Б. Г. Курц, 1885–1938)、沃斯克列先斯基(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等,都只是在自己的著述中附带涉及戈洛夫金使团问题,^②所论问题随著述的主题不一而各有偏重,且大都未能全面利用相关中、俄档案资料。尤其他们的看法大都持一种带有某种偏见色彩的基调,即:这是一个失败的使团,且使团失败之咎全在中方!俄罗斯著名外交家布尔加科夫(А. Я. Булгаков, 1781–1863)在19世纪中叶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③“其中对恰尔托雷斯基(А. Ю. Чарторыйский, 1770–1861)和戈洛夫金均给予了评说,提供了有关使团的简明资料,并分析了这次外交行动的失败对日后俄国东方政策的影响”,^④但对使团的历程缺乏论述。此外,由于阿穆尔河问题是戈洛

① 根据该资料集的前言,编者将所有文件的时间都换算标注为俄历。但俄历时间与现行公历时间有差距。19世纪,俄历时间要比现行的公历时间少12天。为了方便读者,我采取公历、俄历双标注的方式,将每份文件的时间标注为公历(俄历)。这样,既能方便读者根据俄历在资料集中找到原档,又能知道原档的公历时间,不致在时间上误读历史事件。

② Морозкин М. Я. Иезциты в России. СПб. 1867г. с. 311–369;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ткрытие Китая. СПб. 1900г. с. 85, 86;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е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 IX века). М. 1882г. Бартольд В. В.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 Л. 1925г. с. 236; Безпроз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 VII –середина X IX в. М. 1983г.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1917 г.). М. 1974г.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 X VII и X VIII вв. Харьков. 1929г;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Китайские хроники о пребывании И. Ф. Крузенштерна и Ю. Ф. Лисянского в Гуанчжоу. И не распалась связь времен. М. 1993г. стр. 151–163.

③ Булгаков А. Я. Отрывок из записок старого дипломат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858г. Т. I. № 10. с. 291–306; № 11. с. 323–331.

④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сольство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Кита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IX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17.

夫金使团肩负的外交使命之重要一环，因此，某些阿穆尔问题的专家在自己的著述中亦附带论及戈洛夫金使团的访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叙述偏重有关阿穆尔河问题的内容，其余则多略而不记。^① 唯一的专题论文是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为《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所写序言《戈洛夫金使团在中国》。^② 由于作者直接参与了资料整理的工作，因此，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事件的论述较为全面深入。虽然有许多看法亦不尽如人意，但认识到使团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则是理智的。

至于西方史学界，只有郭玫瑰（Quested R. K. I.）女士在其大作中认真提到戈洛夫金访华事件，并对之做了力所能及的相对客观的简要分析。她认为直到19世纪初，中俄两国尚互知甚浅，正是这点导致俄国使团必然失败。^③ 史实不错，但结论太笼统。限于史识，她未能看出这次外交事件背后的异质文化冲突和不同国际关系体制的对抗本质。她特别强调广州贸易风波对戈洛夫金使团成败的影响，显然是受了戈洛夫金报告的蒙蔽。尤其是将中俄礼仪之争的地点由库伦错位至张家口，这种史料上的明显失误无疑影响了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总之，由于研究戈洛夫金使团事件并非作者的主旨，故作者受时代局限，未能熟悉相关的俄文档案资料，对事件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揭露。此后，美国费正清（J. K. Fairbank, 1907-1991）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以其“朝贡制度”理论为基础，由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 1934-1984）执笔，简要涉及了戈洛夫金使团失败事件。弗莱彻认为扩展对华贸易是戈洛夫金使团访华的主要目的，同时，还认为清政府坚持传统的“朝贡礼制”是导致戈洛夫金使团铩羽的直接原因。姑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他至少

① [苏] П. И.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姜延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55-57页；Безprozванных Е. Л. Приамурье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X VII - середина X IX в. М. 1983г. с. 209-215.

②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сольство Ю. А. Головкина в Кита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IX веке. 1803-1807. М. 1995г. с. 5-22.

③ Quested R. K. I.,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8, p. 15.



同样没有触及库伦（与郭玫瑰女士一样，也将库伦错位为张家口）中俄礼仪之争的实质问题。^①

而本应该特别重视这次外交事件的中国学术界，却如米亚斯尼科夫院士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专门的相关研究成果。史料整理除了《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罗列了几份相关档案资料外，就只有王之相（1891-1986）译的《故宫俄文史料》了。王之相将嘉庆年间相关的俄国来档40多份译成中文，于1964年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内部编印，但内容却没有超出《19世纪俄中关系（1805-1807）：资料与文件》（第1卷）的范围。至于故宫所藏的数量可观的汉、满文相关档案史料则至今未能整理出版。在研究层面，20世纪40年代，陈复光（1899-1960）先生在其大作中，曾以两百多字的篇幅简单介绍了戈洛夫金使团访华失败事件；^② 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的集体成果《沙俄侵华史》中，亦曾从俄国觊觎中国黑龙江流域土地的角度提到戈洛夫金使团及其所肩负的外交使命；^③ 蔡鸿生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俄罗斯馆问题，并于90年代出版了名著《俄罗斯馆纪事》。^④ 其中列专章全面论述了与戈洛夫金访华同期发生的“俄船首航广州风波”事件。^⑤ 近年则有王开玺在其大部头著作中从礼仪之争的角度简要论及戈洛夫金使团访华事件，^⑥ 但未能利用俄国专家整理出版的相关俄文档案资料，而且受限于该书的主旨，未能对戈洛夫金使团访华这一外交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详尽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维新博士的论文《嘉庆时

①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345-352页。

②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丛书乙类第1种，1947，第77-78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2卷，第29页。

④ 蔡鸿生先生的《俄罗斯馆纪事》初版于199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后来，又经过先生的增订，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再版。

⑤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第172-196页。

⑥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论争》，人民出版社，2009，第158-169页。